

方军
抗战采访手记

战争最后的证言者

忘记过去

沈玄味 题

方军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方军
抗战采访手记

战争最后的证言者

方军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战争最后的证言者 / 方军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474-0085-2

I. ①战… II. ①方… III. ①军人—访问记—中国—
现代②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① K825.2 ② 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2578 号

责任编辑 秦 超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60 × 230 毫米

9.5 印张 2 插页 97 幅图 2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定 价 2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战争最后的证言者	/ 1
参战中日老兵长期友谊最后的保持者张访朋	/ 81
我拜托胡主席访日时带去我一个老兵的心愿	/ 100
松山战役最后的少校营长林裕琪	/ 123
两个被遗忘的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八路	/ 138
我认识的抗日军政大学教师徐诚之	/ 160
曾经与金日成并肩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胡真一女士	/ 177
92岁·61年·210块和1脚踹塌的故事	/ 192
击落侵华日军飞机2600架·抗日航空烈士3294人	/ 210
当年抗俘参观中国战俘博物馆	/ 257
又一位走进60年前侵华日军监狱的幸存者	/ 263
搜集亲历抗战的口述史迫在眉睫	
——给《口述淞沪抗战》一书续集写的序	/ 270
中国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印象	/ 278

战争最后的证言者

一 我是怎么认识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的

“战争最后的证言者”这个词汇是从哪里来的呢？

“战争最后的证言者”这个词汇就是出自于1914年2月27日出生的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之口。而且，我们两个人都认为：能来中国谢罪



91岁的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在卢沟桥下跪谢罪。站在本多立太郎身后的见证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馆长王新华和本书作者方军。照片左面拿照相机拍摄的人，是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贺延光先生。2005年5月1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江菲拍摄。

的，参加过侵华战争的侵华日军老兵确实不多了。他本多立太郎确实是“最后”的人物了。

我写这篇稿子的时间，是2010年3月12日星期五。就在前些日子，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还在给我写信。

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在2010年1月11日的来信中说道：“马上去法国演讲。反对日本修正宪法第九条。（日本宪法第九条说的是：日本永远放弃战争。）（他本多立太郎96岁高龄了，）我还想来中国，见市民，见学生，就侵华战争的罪行对中国公众谢罪。”

他还说：“每次到你家，你大量喝酒，这样对身体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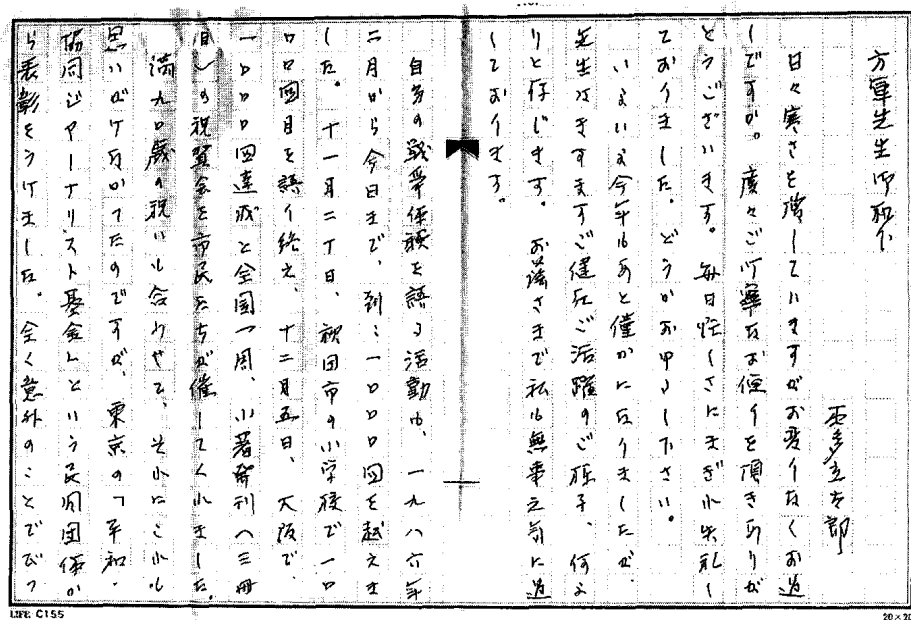
我和本多立太郎相识于1996年12月27日。那一天，我在日本《每日新闻》的报纸上认识了他。在这篇报道中，当时82岁的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主张：“把慰安妇的实情告诉日本的年轻一代。”我当时还在日本国学习，我急忙给我的“老上级”，原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的社长丹藤佳纪先生去电话，希望和这位住在日本和歌山的老人建立联系。

我1984年开始，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我的第一任社长叫丸山胜，第二任叫高井洁司，第三任社长就是丹藤佳纪先生。日本《读卖新闻》报社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家在北京建立记者站的日本报纸。日本《读卖新闻》发行量过千万份，是日本国发行最多的报纸。

我在日本《读卖新闻》工作的内容，有一项是按照中国的国情做剪报。这些国情分为：政治、军事、历史、经济、工业、农业、教育、科研、法律、人物等等。我看的报纸，全部是中国的报纸。所以，所有的消息来自于中国的报纸。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属于中国外交部下属的外交人员服务局，我作为助理翻译担当驻华日本记者的助手。由于工作习惯是“剪报”，所以，我到日本国以后，凡是有问题，马上联系日本《读卖新闻》的老记者丹藤佳纪先生。

笑呵呵的丹藤佳纪先生说：“没有问题，马上帮助你联系。”

电话中，丹藤佳纪先生说：“联系啦！82岁的本多立太郎在中国作过战，参加过对华的侵略战争。他已经在日本国内演讲多年了，他的口头禅叫：‘送上门，给您讲战争的体验。’已经讲了几百次啦，日本的都、道、府、县，他都去过。他也很想见您这个中国人呀。不过，他在日本国的和



本多立太郎 2010 年 1 月 11 日的来信

歌山居住，怎么办呢？他什么时候来东京的话，我安排你们见面吧。”

我就是这样认识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的。之后，我们通信有 100 多封。

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秦超编辑是一个认真的人，他最近在电话中催促我：“写完本多立太郎了吗？要不，是不是就先不写他了？我们先出版《战争最后的证言者》一书吧。”

我感到内疚的很。可是，嘴上仍然坚持我的意见：“《战争最后的证言者》是本多立太郎的话，国军、八路、慰安妇、飞虎队、东北抗联等，他是主线，还是等我写完他吧。”

等我摊开资料，我才感到艰难万分，我驾驭不了这样的题材。96 岁的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作为战争最后的证言者，实际包罗了很多中日两国人民都可以接受的思想；对侵华战争的反思，体现了侵华战争参战日本老兵的忏悔，对侵华战争作为日本国民的思考等等。写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的话，我认为，由中日两国的学者组成的

研究团体共同出版一些图书比较好。或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的几个学者组成专门的研究机构；或者，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研究部组成一个研究小组？或者，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日本国作家协会共同合作研究这个人物比较恰当。因为，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实在是内容太多了。如果是我写的话，也只能是浮光掠影、草草记录一些回忆吧？

96岁的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在来中国参战之前，是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所以，这个日本老人是满腹经纶。他除去写了四本书之外，还有他们部队的一个日本兵写的已经出版成书的回忆录。在这本书中，记载了1939年，本多立太郎去江苏金坛县驻防之前的一些故事。其中，有56名侵华日军士兵在1938年江苏的一次大雪中，艰难行军而冻、累而死的故事。

我所说的、和本多立太郎一个部队的老兵写的这本书，是旅日中国学者、陪同本多立太郎来华谢罪的朱弘先生带来的。当时，千头万绪的事情全部由我一个人处理。我也只是抽空扫描了侵华日军出版物其中的照片。扫描一张照片4元，50张照片多少钱？全部自费。侵华日军老鬼子自己写的书，由朱弘先生送给江苏金坛的学者范学贵先生了。后来听说，范学贵先生把这本侵华日军老鬼子写的、侵华日军在金坛驻防的回忆录，转交江苏金坛市的史志办公室了。如果，把这五本书，加上侵华日军老兵和本多立太郎的大量来信翻译、分析、研究、出版的话，不但对于中国人民对战争的回顾、思考；对于日本国民都是很好的警醒和告诫。

我一个人，形单影只、势单力薄。难以驾驭这么丰富的题材，只好简单记录了。

侵华日军老鬼子本多立太郎来华谢罪，我一个人忙到了极点。翻译、到机场接送，住在我家，吃什么？厕所的洗澡水怎么样？喝什么茶？几点起床？和什么媒体联系？《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江菲、摄影记者贺延光先生要来我家采访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怎么接待？

我带侵华日军老鬼子本多立太郎去人民日报社人民网接受采访，我的汽车在三环的车龙水马中熄火了，还有29分钟就开始直播对网友的对话，怎么办？我出了一身的大汗。

二 谢罪之难、难于上青天

《谢罪之难，难于上青天》一文，是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由于时间久远，我一时没有找到中国青年报的剪报。但是，文章内容说的是：“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想来谢罪，可是，中国什么单位都不管。比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馆长张承均就说：‘你自己弄吧。我们不管。’本多立太郎来谢罪主要是想见市民和学生，演讲。他说：“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跪下。”我这里有他写的信件为证。他来北京光见我没有什么意思了。

我联系了几所大学，都不成，说“必须要有上级单位的介绍信！”

我找了社科院相关单位的负责人，他听了以后，说：“你给我出去！我叫警卫啦！”我当时，从北四环往家走，浑身上下都凉了。那个沮丧呀！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下面，我只能发表2000年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原稿：

《谢罪之难 难于上青天》

在采访老八路、老新四军的同时我还在采访侵华日军老鬼子。

这其中，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给我来信最多，前前后后有三十几封。他说：“我第一，想在中国的土地上下跪，谢罪。第二，我想和中国人成为朋友。我已经86岁了，对于人世间的其他事，我一无所求。”

“我谢不成罪，要我儿子来，儿子不成再让孙子来”，他白纸黑字写道。

我认真研究过本多立太郎的思想，他认为：侵华战争首先是为了掠夺，他对自己曾经屠杀中国战俘而深深地感到罪恶，他对日本右翼的叫嚣深感遗憾，认为他们代表不了多数日本国民。他在来信中说：“现在日本发生了非常危险的状况：改宪、扩军备、征兵，而且一部分政治家、文化人和右翼团体更加露骨起来。我亲眼目睹过1936年2月26日，原来被称为是二二六事件的政变，从那时起，日本开始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今天的情况也让我非常担心。”

我和本多立太郎的交往也被日本报纸所披露，今年2月19日的《纪

伊民报》上，在《想与中国学生直接交流》一文中，日本记者这样报道：

“本多立太郎于昭和14年被招集入伍去中国打仗，昭和16年回国。昭和18年又一次去日本国北千岛参战，后被抓到西伯利亚流放，昭和22年回国。

“关于战争的印象，在演讲之前他甚至从来没和家人说过。退休后，想到应该让年轻人们知道过去，所以，开始讲参加战争的体验，这其中包括在中国战线上屠杀中国战俘的内容。本多立太郎热衷于这项活动，自嘲地把它戏称为‘出前’（日语意为：送货上门）。演讲至今为止已经进行629场，听众达八万人次。

“在日本有过留学经历的中国作家方军对本多立太郎说：‘你为何不给中国学生也讲一讲呢？’于是，方军向本多立太郎发出了邀请。为此，本多立太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自费去中国。

“本多立太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国演讲也坚持用‘自己亲眼所见、亲手所干’的记忆讲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如果中国大学生提问的话，他很乐意有这种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遇到尖锐的攻击也要以诚相待，‘我想谢罪和握手，难道中国人不了解我真诚的心情吗？’他这样说。”

侵华日本老兵本多欲来华谢罪本在我的意料之中，很多人以为只有东史郎一个老兵谢罪，其实不然。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至今在中国参加过战的谢罪老鬼子已经不胜枚举，只不过，近几年让12万日本右翼上窜下跳遮掩其存在而已。抗战胜利已经55周年，今天，不仅分布在日本全国的840个右翼团体在蠢蠢欲动，而且，一种新民族主义思潮正在形成气候，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教训“支那人”已经成了随随便便的行为。我想，我们纵有千军万马，不主动出击也只有招架的份。何不在“谎言被说到90遍”的时候也说说真理？而且，多找几个愿意谢罪的“亲历者”说。

但是，谢罪就要有方式，我想安排侵华日军老鬼子本多立太郎和老八路黄廷廉，原国民党29军上尉军官、89岁的韩立才先生同台演讲。估计，不但会满堂出彩，而且，做成电视片的话，还会具有永久保留的价值。

可是，谢罪就要有场地、听众，这一下可难倒我了。我去了北京几

所大学，回答都是一样：“侵华日军老鬼子演讲要介绍信，老八路演讲要介绍信，国民革命军第29军老兵韩立才演讲就更要介绍信。”可是，没有一个单位愿意给我开介绍信。

我不是介绍信，我也没有介绍信。我是老太太吃柿子——喂瘪子。

可是，我有嘴，我对大学的老师们说：“亲历过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的讲话真感人，比方韩立才老人，他参加过卢沟桥保卫战、台儿庄战役，还当过解放军的上尉军官呢，多少年来，他著书立说十几本为揭露侵华日军的罪行做了许多工作……”

面对我的口干舌燥，老师们笑笑，摊过来一只手，重复说：“——介绍信！”

本多老人和韩立才老人也常常给我写信或者打电话或者发传真询问：“我什么时候去演讲呢？时间和地点定下来了吗？快告诉我吧。我老头子军人出身，已经准备好了。”

我也很苦恼，谁都可以等，惟独“最后一批人”等不得，原因您知道：耄耋老人。

面对我的苦恼，我的一个好朋友很关心我，他在电话里说：“着急了吧，你个傻帽儿！你是吃饱了撑的！你看看电视连续剧小燕子、喝杯茶，好不好？”

下面，是2002年12月24日发表于《团结报》的文章，全文如下：

《谁来帮帮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的忙》

1

88岁的侵华老兵本又来信了，他一来信，我就感到十分的为难。

他说想再来中国谢罪，可我帮不上他的忙，这让我感到很内疚。不是我没有认真地帮过他，实在是我的能力有限。我三年前就拿着他的几十封信四处游说，我先找到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领导，我希望他们能接待来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可是，馆领导很和气地说：“我们不管，你自己办吧。”

我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是北京市酱油厂的话，这么回答就是合情合理的。

我又在北京找了几所大学，希望他们接纳来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本多来中国完全是自费，他在日本国内演讲20年，800多场，听众累计达九万余人。他是侵华日军老兵中以现身经历批判日本国侵华罪行的人物之一。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北京的几所大学都很担心。因为没地方谢罪，所以他还是来不了。

我曾经安排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在北京公安大学、成都的四川大学和重庆的一所大学演讲过，效果很好。

我和另外的八十多岁的男、女侵华老兵分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节目，还获得过大奖。惟独他，不知怎么，老是困难重重。

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写过一篇叫《谢罪难，难于上青天》的文章，说的就是他。

前年，我去日本参加我写的书在日本国发行的纪念仪式。在一次演讲活动中，有数位日本右翼学者在会场攻击我。参加会议的侵华日军老兵81岁的伊桥彰一当场站起来，用自身的经历讲明侵华战争中日军所犯下的罪行。他说：

“1958年，中国政府特赦了我们这些战犯。回到日本国我才知道美国飞机把我家五口人全部炸死了。将心比心，那时我才深深地体验到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犯下的罪行是多么深重，我才感到周恩来、毛泽东的特赦政策在历史长河中是多么的伟大。”

在那个会上，我多么希望见到本多立太郎呀。可是，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没来。

今年5月，本多立太郎连着来了五封信，说他要途经上海。我马上自费从北京去上海见他。不想，他一下船就被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人接走了。马上，我在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里见到了在南京谢罪的本多立太郎。历史的机遇就是这样，让我们擦肩而过。事后，我把车票寄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希望他们给我报销一部分。南京方面坚持原则，理都没理我。

“我收入1300，为见一次你，我用了1200，还没见到”，我在给本多的信中这样写到。

为此，我十分羡慕日本国的右翼学者，他们有强大的经济实体的资

助。我也非常佩服中国的贪官污吏，他们能用着人民的钱一次又一次地登法国埃菲尔铁塔、游历欧洲。

可是我，捉襟见肘。

2

日本国发动的侵华战争是1931年到1945年之间发生过的事情。时至今日，经历过战争的人已经非常少了。根据我的统计，中国经历过战争的老战士平均年龄79岁，日本国经历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平均年龄81岁。侵华战争中，中国人伤亡3500万人，其中中国政府军将士在战场上伤亡327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地方军、游击队伤亡53万人。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被毙、伤、俘154万人。日本战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人数为128万人。

今天，亲历过战争的已经寥寥无几。参战者不在了，历史的一页就真翻过去了。

中国人总是批评日本人不关注历史，其实，今天在中国，又有几所学校请老新四军、老八路、老游击队员给年轻人们讲讲过去呢？更何况有侵华日军老鬼子来谢罪了。

本多立太郎没有一封信不谈谢罪之情，我帮不了他，所以汗颜。

本多作为曾经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他是给我来信最多的一位，平均每月两封。他的来信先后被许多博物馆征集，四川一家博物馆一下就征集走了十封信。

老鬼子的来信，白纸黑字，作为研究战争历史及鬼子兵心路历程方面有一定价值。

我和本多立太郎老人认识五年，通过百多封信，打过数次电话，可就是没有见过面，可惜之至。他的信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寄来自己出版的报纸，一部分就是信件。

本多老人作为日本国民在日本国发动侵华战争期间，作为侵华日军的士兵曾经在中国参战数年。他的部队就在南京周边，他送给我的自传体回忆录《想听西班牙波利乐舞曲》一书中，详细描绘了他作为侵华日军的士兵枪杀中国政府军俘虏的情景。他的自传体回忆录的扉页上写道：

“谁要再发动对外国的侵略战争，就先让战争的列车从我身上压过

去！……”

参加侵华战争之前，本多立太郎在东京的《朝日新闻》社工作，作为资深报人，老头儿自己今天还在办报纸。他的报纸是手写的，叫《顽皮报》。每月两期，来稿为日本国各地的读者通过邮寄或者传真发来的。社论由本多老头儿自己写。印刷是复印，发行是通过日本国邮政局邮寄，看报人是本多老头儿自己发展的对象，发行数量是300余份。《顽皮报》报社的社址当然就是老鬼子本多立太郎自己的家。

为了办好他的报社，他还封我为北京分社的社长，并且，寄来一份委任状。我写信告诉本多，这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完了，非让革命群众把我打死不成。

无独有偶，老八路也有自己办的报纸，总政话剧院的刘大为是老八路，他们办的报纸叫《爱晚情音》。这样，除了侵华日军老鬼子给我邮寄自己的报纸之外，老八路也把自己办的报纸送给我。“鬼子报纸”和“八路报纸”在57年前就有过，今天，能安排谢罪的老鬼子和当年的老八路见见面，“交换交换今天的报纸”才是正事儿。

自然规律不等人呀，五年后鬼子、八路、新四军都进博物馆了，即使想见，难了。

3

本多立太郎是日本国的老知识分子，他总使用江户时代日本人通信的习惯说：“我跪在您的桌前叩拜”。

这样开场白，如今的日本国年轻人恐怕都不知道了。我爸爸是1937年的八路，他的哥哥和弟弟都被日本兵杀害了。我爸爸比本多立太郎小10岁。按照中国人尊老爱幼的习惯，不能使用这样的词汇。但是，我感觉，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的信并不是写给我个人的。

这次，他在信中说：“我都88岁了，机会不多了，我心中的罪一定要当着中国人的面说出来，您如果能帮我的忙，那该有多好。”我知道他希望见学生、市民，参观抗战馆。

他曾经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我先跪下。”

他的自传体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巨大的水车在缓缓的转动，后面是长江支流、或者叫干渠的滔滔流动的河水。夕阳西下，四面突然枪声

大作，是中国政府军的枪声！军官抡起军刀声嘶力竭地大喊：‘赶快把他们都处理掉！’”

少尉军官拔出手枪，如果有谁敢不执行军令，按照日本陆军条例：就地枪决！

“我们都端起枪来向用绳子栓成串的中国战俘走去。三八枪刺在夕阳下泛着寒光。一个中国战俘，他反绑着手面对着我，微笑。夕阳把他镀成金子的颜色。我哆嗦着，一刀刺进他的胸膛，他‘啊’了一声，倒在长江支流、或者叫干渠的浪涛里。鲜血翻滚着，长江一侧、四处是滚动的尸体，四处是我们犯下的罪恶……”

“我永远忘不了那‘啊’的一声，和夕阳里他给我的微笑。”

我没有办法接待本多来谢罪。我找不到他谢罪的对象：学生、市民、抗战馆、社科院。

我为了掩饰我的无能，我给他写信说：“……我可以带你去长城、故宫和颐和园。这我轻车熟路！”

他很生气地回信：“我不是要去玩的！你别把我理解错了。”

我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在日本国留学六年中，我利用送外卖的机会采访了22名侵华日军老鬼子；1997年回国至今，我与五名侵华日军老兵有各种交往。惟独88岁的本多立太郎是我付出的努力最多，而收效甚微的一个人。谁能帮帮他实现人生最后的理想？

我经常在抗战馆门口发愣，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照在邓小平的题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如果是“北京酱油厂”的话，应该是对侵华日军老鬼子来谢罪不感兴趣的，这是合情合理的。我想，起码，抗战馆的研究人员是可以接待来谢罪的老鬼子的。

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在日本国的地址是：

邮政编码645-0210和歌山县日高郡南部川村清川214梅里庵

本多立太郎家的传真和电话是：0081-739-76-2245。

有兴趣的话，请您和他联系吧。拜托啦。

毕竟，战火硝烟已经过去57年，中国和日本都需要一个新的篇章。

三 当时抗战馆的领导都在忙什么？

是呀，我请您说说，当时抗战馆的领导都在忙什么呢？十几年了，我不敢问。要不是学习了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我还是什么也不敢说。

温家宝总理说：“要把查处违法违纪大案要案，作为反腐败的主要任务。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各项制度。要坚持勤俭行政，不断降低行政成本。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温家宝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看了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我这个工龄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35年的老党员胆子大了一点。我当着各位，把我的疑问向大伙儿说一说：

“这侵华日军老鬼子本多立太郎、盐谷保芳、伊桥彰一、宫永正风等人，要来位于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来谢罪，怎么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领导老是不管呀？这要是北京腐乳厂的臭豆腐车间不管，才是正茬儿。也可能他们是外国人的缘故吧？是日本人？那么，是朝鲜人怎么样？饱受侵华日军摧残的朝鲜慰安妇朴永心来北京，抗战馆的领导也是坚决不见。我还提前半年写了报告，他们事前同意了。朝鲜老太太朴永心一行风尘仆仆从平壤来到抗战馆的门口，目的就是在抗战馆展出的、她当年的照片前站一站。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领导握一下手，可是抗战馆的领导突然改主意了：坚决不见。坚决不握手！”

我对朝鲜同志说：“我代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行不行？”

朝鲜同志摇头：“不行，你下岗了。不能代表。”

我说：“那，我是中国作协的，我代表中国作协行不行？”

朝鲜同志经过商量，这次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不屑和鄙夷：“那就不成了！”

在北京站，我送朴永心一行上火车。他们去南京、云南滇西抗战地区。我耿耿于怀，小声问一位朝鲜同志：“我为什么不行？”

朝鲜同志很和气，他小声告诉我：“我的中文，你知道我跟谁学习的？”



著名的照片：慰安妇朴永心



与朴永心一同被俘的慰安妇